

## “一带一路”十周年专题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公共产品视角下  
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杨志敏 芦思姮 林 博

**内容提要：**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确定性和稳定性，展示了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力量，取得了辉煌成就，并日益受到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过去十年，尤其是2017年以来，发展事实和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五通”及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三类公共产品，夯实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基础，进而又主要以制度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的形式，分别提升和拓展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区域维度和全球维度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上建立的良好合作反过来又促进了中拉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并形成良性互动。由此，“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拉双方构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这既保证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地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又为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双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增添了合作新动能。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 拉丁美洲 互联互通 合作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杨志敏，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区域合作研究室研究员；芦思姮，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区域合作研究室副研究员；林博，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区域合作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3)03-0047-23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一带一路’与中拉互联互通研究”（编号：2021LMS B04）和青年学者资助项目“全球数字治理情境下中拉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编号：XQ2022004）的阶段性成果。

2023 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回想 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致辞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sup>①</sup>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为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破解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受到了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尤其是 2017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强调拉美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以来<sup>②</sup>，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步伐提速、成果丰硕、前景可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又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sup>③</sup>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开展全球治理、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有研究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无论是在器物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sup>④</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sup>⑤</sup>与此同时，早在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就深刻阐述了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内涵：“今天，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

① 新华社：《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2017 年 5 月 15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7-05/15/content\\_5194130.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7-05/15/content_5194130.htm)。[2023-05-01]

② 新华社：《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2017 年 5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7/c\\_1120990249.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7/c_1120990249.htm)。[2023-04-15]

③ 2014 年 7 月 17 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宣布中拉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https://www.gov.cn/xinwen/2014-07/18/content\\_2719810.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4-07/18/content_2719810.htm)。[2023-03-19]

④ 李向阳：《“一带一路”：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载《经济日报》2023 年 1 月 19 日第 10 版。

⑤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25 日。<https://www.gov.cn/zhuanti/zggcdescqgdbdh/sybgqw.htm>。[2023-01-20]

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sup>①</sup>

鉴于作为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相关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本文尝试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探讨以“五通”<sup>②</sup>为核心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夯实中拉双边维度合作伙伴关系、拓展区域维度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全球维度合作伙伴关系并进而构筑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推动机理和现实成效。

## 一 文献综述

严格意义上讲，公共产品理论在国际学界开始引发广泛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典著作《公共支出的纯理论》。<sup>③</sup>此后，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sup>④</sup>及贝冢（K. Kaizuka）和桑德莫（Agnar Sandmo）等经济学家对相关概念及分析范式的丰富与拓展，这一理论体系日臻成熟。<sup>⑤</sup>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公共产品存在及供给的必要性源于市场机制失灵前提下，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量进行干预。鉴于此，公共产品具有三重显著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及受益的非排他性。

### （一）置于国际维度的公共产品

#### 1. 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界定。公共产品理论最初应用于处理一国层面的

<sup>①</sup>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全文）》，2014年11月8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11/08/content\\_2776523.htm](http://www.gov.cn/xinwen/2014-11/08/content_2776523.htm)。[2023-05-22]

<sup>②</sup> 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向全球提供互联互通、金融机构、共同理念、全球治理四种公共产品，参见郑东超和张权：《“一带一路”为世界提供四大公共产品》，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5期。而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向全世界提供五种公共产品，即“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sup>③</sup> Paul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6, No. 4, 1954, pp. 387-389.

<sup>④</sup> 参见 James M.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in *New Series*, Vol. 32, No. 125, 1965, pp. 1-14; James M. Buchanan, “Public Good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Note on the Minasian-Samuelson Discussion”, in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 10, 1967, pp. 193-197.

<sup>⑤</sup> Keimei Kaizuka, “Public Goods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Production”, i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7, No. 1, 1965, pp. 118-120; Agnar Sandmo, “Public Goods and the Technology of Consumption”,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0, No. 4, 1973, pp. 517-528.

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此后，被奥尔森（Mancur Olson）、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以及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知名经济学家引入国际关系范畴。<sup>①</sup> 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应运而生，旨在解决国家间政治经济秩序与合作激励问题。对此，英奇·考尔（Inge Kaul）等人将国际公共产品定义为“收益扩展到所有国家、人民和世代的产品”<sup>②</sup>。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公共产品收益的疆域范围差异，国际公共产品可分为全球性及区域性两种表现形态，其中，后者意指跨越国界的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且其利益惠及整个地区而非辐射全球的国际公共产品。<sup>③</sup> 此外，全球性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且在特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

2. 国际公共产品增加供给的必要性。从实现条件来看，在传统的市场失灵加之超国家层面政府缺失的前提下，金德尔伯格强调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必要性。<sup>④</sup> 与一般公共产品相较，国际公共产品弱化了一般特征，将逻辑着眼点放在更大地理范围内的集体行动上。<sup>⑤</sup> 具体而言，随着主体与条件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公共产品陷入供给困境，全球主要行为体因供给能力存在异质性，需要共同做出有效的路径选择。与此同时，这种互动模式反过来作用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尤其是影响了国际秩序主导权归属。其中，“霸权稳定论”便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一种阐释。根据这一学派的奠基者吉尔平所述，在政治经济各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取其他国家对其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进而实现世界体

① 参见 Mancur Olson,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4, 1971, pp. 866 - 874;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 - 254; Charles P. Kindleberger, “Standards as Public, Collective and Private Goods”, in *Kyklos*, Vol. 36, No. 3, 1983, pp. 377 - 396;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1986, pp. 1 - 13;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Defining Global Public Goods”, in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

③ 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44页。

④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1986, pp. 1 - 13.

⑤ Chen Cuicui and Richard Zeckhauser, “Collective Action in an Asymmetric World”, i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58, 2018, pp. 103 - 112.

系的繁荣与稳定。<sup>①</sup>

3.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动力源。从驱动因素来看，在当今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剧的全球生态下，以考尔为代表的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维度分析了打破地理边界，加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动力源<sup>②</sup>，主要包括要素跨境流动的持续增加；技术进步创造了新的全球目标；经济增长与人口扩张压力加剧，需要秉持更严苛的环境约束开展集体行动；全球各方势力割据呈现碎片化，导致一些国家层面的公共产品具有了跨境属性；金融和商品市场的一体化或将局部不稳定传导至地区甚至全球层面；基于加速共享的信息数据，互联网的外部性通过对市场的整合与重塑，进一步扩张了数字服务的应用范畴，作为支撑世界贸易、金融和信息流动所需的国际公共产品迅速崛起。

## （二）“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1. 具备典型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作为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消费方面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自2013年提出伊始，倡议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参与，所提供的全球性及区域性公共产品向所有国家和地区敞开大门，从未设置限制性和约束性的制度壁垒。在受益方面，倡议则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特征的正外部性长期外溢，辐射全球互联互通体系。

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虽源于中国，但机遇和成果属于世界，因此积极寻求互利共赢，以合作谋发展，旨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的全球合作共治提供重要实践平台。无论从受众面还是从效用范围来看，倡议均符合经典理论范式下的公共产品特征。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在继承传统国际公共产品属性的同时，基于新义利观和发展导向的多边合作秩序构建，从实践层面实现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创新，进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

<sup>①</sup>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物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7-13页。

<sup>②</sup> 参见 Inge Kaul and Pedro Conceição (eds.), *The New Public Finance: Responding to Global Challen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nge Kaul et al. (eds.),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anag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Defining Global Public Goods”, in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之路。

2. 能够纠偏失衡的供求关系。由上文评述可知,传统西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过于集中在全球或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方。高程指出,以往文献关注重点在于以作为供给主体的霸权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构建及其主导权争夺,从而相对忽视了参与国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由此衍生的霸权稳定论分析逻辑则建立在单向度的供给及其引致的供求失衡基础上。<sup>①</sup>由此,霸权国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与个人偏好做出供给决策。高度依赖这种带有强烈自利动机的国际/地区秩序不仅会导致公共产品“私物化”,长期以来,会使全球或区域“供给困境”陷入更为严峻的局面。<sup>②</sup>

吸取这种教训,学者黄河从需求端出发,提出共同利益会激励国家或国家集团联合起来,共同设计一套制度安排,以应对既有国际秩序下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情况。<sup>③</sup>对此,张建新探讨了除霸权国供给以外,全球化背景下其他多元化供给渠道,尤其是合作供给模式。<sup>④</sup>根据奥尔森的阐释,在面对共同问题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偏好集体行动,而正是对这种集体行动的需求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必要性。<sup>⑤</sup>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语境下,自2013年提出伊始,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供给在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经营”与治理过程中,致力于规避这种供求结构的错配,树立并大力倡导“义利兼顾、有予有取”的新义利观,以期“通过经济共赢,重塑关系秩序;基于务实合作,实现发展利益的相互嵌入;以利益因素为纽带,形成战略化协同的关系共同体”<sup>⑥</sup>。基于这一价值导向,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供给模式,中国提供的全球/区域性公共产品立足于共建国家或地区的实际发展诉求,旨在加快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建设,探索

① 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载《国际政治与经济》,2021年第11期,第8-9页。

② 参见 Bruce Russett, “The Mysterious Case of Vanishing Hegemony; or, Is Mark Twain Really Dead?”,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2, 1985, pp. 207-231;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1985, pp. 579-614.

③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41页。

④ 张建新:《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第31-37页。

⑤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12页。

⑥ 刘毅:《国际公共产品的战略面向——“一带一路”义利观新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4期,第115-121页。

合作增长的动力来源，形塑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或为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治理及构建以价值链体系为核心的区域秩序提供新的平台。<sup>①</sup>

3. 增加以发展为导向的有效供给。在既有国际秩序下，美西方国家提供的全球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以规则导向为主，即从上层建筑出发，意在以规则的激励与约束作为牵引力，构建公正合理、促进全球多元化发展的国际秩序。如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以关贸总协定（GATT）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及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等等。<sup>②</sup>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全球规则却凸显了权力博弈情境下的南北差异，国际公共产品的收益逐渐被霸权国家“私物化”，或因大国对主导权的破坏性竞争导致分配结构失衡。随着规则向日渐失灵，公共产品供给体系陷入负向的“路径依赖”。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实现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需要激发全球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发展导向属性，即从经济基础着眼，立足于功能性视角，探索南南合作的条件及立场协调的趋同性，以期实现合作收益的最大化。正如李向阳明确界定的，与现有规则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相比，“一带一路”呈现出发展导向型特征，这决定了它可以和业已存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或沿线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对接。<sup>③</sup>基于此，与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中国在日趋孱弱的多边治理结构下寻求破局之道的关键一环。

## 二 典型性事实

十年来，中拉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与中国携手打造了“南南合作”的典范。受广泛的发展利益驱动，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实现了对涵盖

<sup>①</sup> 陈辉、王爽：《“一带一路”与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2期，第171页；马涛、陈曦：《“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第135页。

<sup>②</sup> 王玉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的超越》，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80-81页。

<sup>③</sup>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34-46页；李向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位”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33-43页。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球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合作擘画互联互通新蓝图、贸易和投资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资金融通持续深化创新等，中拉民众共享了“一带一路”合作的成果。在双边维度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上，又分别推动和提升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在后两个维度上的合作进一步夯实了双边维度的合作伙伴关系。本文从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维度构建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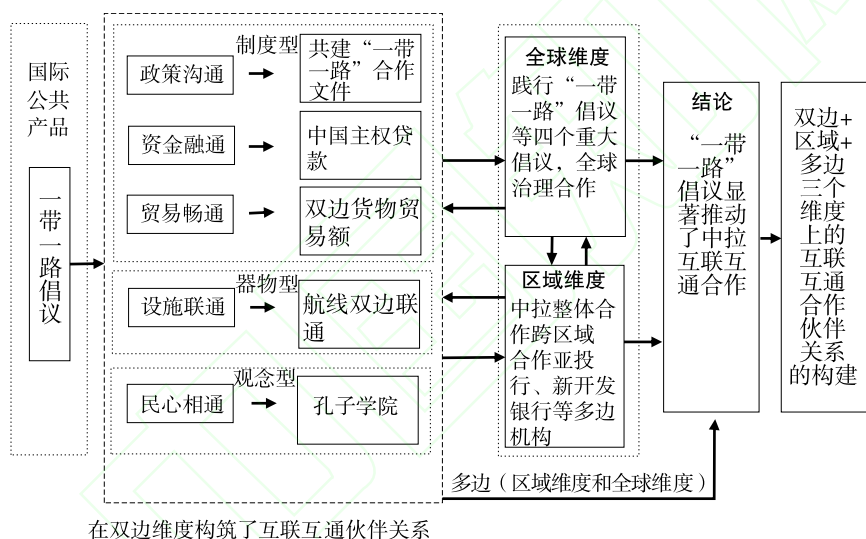


图1 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分析框架图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指导下，“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发挥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三类公共产品的各自功能，形成“五通”齐头并进的局面，还实现了观念共商—制度共建—利益共享的深度推进。尤为重要的是，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充分释放南南合作的发展潜能与互补优势，助推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更具针对性的务实合作，进而共享更多的发展红利和治理实效。<sup>①</sup>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要秉持“共商共

<sup>①</sup> 谢来辉：《“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一个类型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34页。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重大意义所在。<sup>①</sup>

### （一）夯实双边维度的合作伙伴关系

1. 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的器物型公共产品。根据世界发展指标（WDI），与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相比，拉美国家基建能力发展相对滞后<sup>②</sup>，且近年来受当地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贸易开放度大幅提升，及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等因素影响，基础设施脆弱性正在成为制约地区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域内各国对构建系统性基础设施的诉求日趋紧迫。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兼具基建国际化的能力与意愿，通过大量海外基建项目输出，如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电力和油气管线等工程建设，积累并提升了资源、经验、技术相关的比较优势。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统计，在2022年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全球工程承包商前20名中，中国企业占据7席。<sup>③</sup>

有鉴于中拉双方在供需层面的高度互补性，近十年来，中拉基础设施合作成果显著，大型基建项目加速落地。铁路方面，墨西哥政府力推的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玛雅铁路，由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第一标段工程已经进入铺轨阶段。公路方面，中资在美洲第一个公私合营项目（PPP）——马道斯高速公路（MAR2）建设稳步推进，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实现全线通车，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特立尼达公路改造升级项目进展顺利。港口桥梁方面，秘鲁钱凯港成为中企在南美投资建设的第一个落地项目，巴拿马运河四桥项目进入收尾，中企在墨西哥承建的维拉克鲁斯新建港口第三标段项目和在智利第一个公私合营项目佩托尔卡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均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航线建设方面，北京—巴拿马城直航航线开通为双边经贸和人员往来带来了极大便利，武汉—墨西哥城定期货运航线建成大幅提升中国中部地区同拉美国家的航空物流时效。新能源方面，阿根廷最大风电工程——赫利俄斯风电项目群完成整体移交，巴西美丽山水电送出一期、二期工程是中企在海外中标的

<sup>①</sup> 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2015年10月17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xgdt/68687.htm>。[2023-05-08]

<sup>②</sup>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wdi.worldbank.org/tables>。[2023-06-03]

<sup>③</sup> 进入前二十位的中国基建企业按名次分别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参见工程新闻纪录（ENR）官网：Engineering News Record, *ENR's 2022 Top 250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https://www.enr.com/toplists/2022-Top-250-International-Contractors-Preview>。[2023-06-01]

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标志着中国特高压技术“走出去”取得重大突破。<sup>①</sup>

由此可见，中拉对这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既带动了中国实现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提升，增强了国际竞争新优势，也大幅提高了拉美整个区域的货物、服务、人员和技术的流动性，改善了拉美广阔内陆地区的闭塞环境，提升了区域内的互联互通能力。以巴西美丽山水电站项目为例，通过打造一条贯穿南北、稳固快速的“电力高速公路”，把巴西北部的水电大规模输送到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将显著缓解该国南北电力资源分布不均问题，同时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美丽山水电站项目切实推动了巴西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该项目为实现巴西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贡献了“中国方案”，因此成为中巴两国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以及国际产能合作在拉美地区的重要成功实践。

表 1 “一带一路”倡议在三个维度提供的公共产品类型分布

	“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公共产品		
	器物型公共产品	制度型公共产品	观念型公共产品
	设施联通	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政策沟通、民心相通
双边维度	●	●	●
区域维度		●	●
全球维度		●	●
以上三个维度	●	●	●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2. 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的制度型公共产品。十年间，中国与拉美国家共商共建共享“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 2023 年 5 月，中国已与 21 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2017 年 6 月 13 日、2018 年 5 月 1 日、2018 年 8 月 21 日和 2023 年 3 月 26 日，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相继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与中国建交。2021 年 12 月 10 日，尼加拉瓜与台湾“断交”后，尼中恢复了中断 21 年的外交关系。除刚刚建交的洪都拉斯之外，上述国家在与中国建交或复交后不久，均已加

<sup>①</sup>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巴西美丽山水电送出一期、二期工程项目》，2021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ndrc.gov.cn/xwdt/ztl/zlcnlyutzhz/202112/t20211228\\_1310282.html](https://www.ndrc.gov.cn/xwdt/ztl/zlcnlyutzhz/202112/t20211228_1310282.html)。[2023-05-03]

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中国与拉美国家政府间签署的双边协议中涉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开发内容逐年增加，双方持续推动广泛而深入的战略对接及合作机制建设。而洪都拉斯在与中国建交后，已明确表达了加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强烈愿望。

在“顶层设计”领域，随着“一带一路”制度化体系的逐步完善，双边层面的对话沟通渠道更加通畅。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专项合作规划，以及设立多层次沟通协调机制，中拉双边合作平台日益健全。尤其是两国政府间常设委员会及其分委会在中国和拉美国家双边合作框架下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机制根据双边合作的重点方向而设立，显著降低了国家间利益协调的沟通成本，进而强化了中拉双边合作的务实推进。

在贸易与制度型开放领域，中拉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自2013年以来，中拉货物贸易额相继跃上3000亿美元、4000亿美元和4500亿美元台阶，而且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环境不断改善。中国与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相继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智利的双边自贸协定完成升级，与秘鲁正在磋商自贸协定升级，与尼加拉瓜签署了早期收获文本，与巴拿马、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正在磋商自贸协定，与乌拉圭自贸协定已联合完成可行性研究。值得关注的是，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正成为新时期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新亮点。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与智利、巴西、阿根廷、巴拿马和哥伦比亚5个拉美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

在开发性金融合作领域，一方面，中拉货币互换机制建设加速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有关拉美国家中央银行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并持续扩大与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国家的本币互换规模；另一方面，开发性金融制度建设日趋健全，为中拉重点合作项目提供支撑。近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阿根廷财政部、玻利维亚发展规划部和巴拿马环球银行分别签署电力项目、铁矿钢铁厂项目和流动资金项目的贷款协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巴西石油公司签署《融资合作协议》、与哥伦比亚国家发展金融公司签署《关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与智利公共工程部签署《关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在文明互鉴领域，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力量。这一机构在拉美的发展虽较为滞后，但近些年随着人文交流的日益密切，机构数量呈现逐年稳定增长态势。以墨西哥国立自治

大学孔子学院为例，该校由北京语言大学承办，学生人数由运营伊始的 80 人增加到目前每年 1200 人左右。中国国内方面，西语教育的机构建设让文明互鉴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西语高等教育呈井喷式发展。目前，全国共有 58 所高校设立了西语本科专业。<sup>①</sup>此外，国内拉美研究机构蓬勃发展。在国内已有的拉美研究机构中，有近 2/3 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成立的。<sup>②</sup>

3. 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的观念型公共产品。当前共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形式日益丰富，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愈发包容。尤其是在思想理念与发展价值观上的互学互鉴，极大地增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为双边合作迈向高质量、可持续道路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共建“一带一路”积极促成了很多“小而美”的社会项目，切实惠及了当地民生。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拉美国家强烈希望能够借鉴中国的脱贫经验，为其反贫困斗争提供宝贵的经验支持。在密切中拉民间互动交流中，中方各界以文载道，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向拉美传递了扶贫扶志的精神。其二，共享经济理念契合中拉高质量共建发展要求。大变局下，数字化与全球化加速同频共振。顺应这一趋势，中拉共同推动“数字丝绸之路”既是顺应全球经济生态转型的时代要求，亦成为双方高度释放合作潜能与互补性红利的必然选择。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数字科技企业将共享经济理念带到了拉美各国。以在拉美地区高度“本地化”的滴滴出行为例，截至 2022 年年底，滴滴的运营市场已遍及拉美十国，提供出租车、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多项智慧管理服务，迅速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共享出行移动平台之一。这种创新性的开拓方式不仅有利于优化拉美当地交通出行与城市管理，进而带动当地新基建及产业技术服务的迭代升级，更为更多中国新经济新业态企业走进拉美提供了先驱性的经验借鉴。

## （二）拓展区域维度的合作伙伴关系

1. 制度型公共产品的作用。其一，在中拉整体合作层面。2015 年“中国—拉共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正式开启，标志中拉进入“1+1”双边合作与“1+33”整体合作的新时代。此后，中拉论坛发挥了重要平台作用。中

<sup>①</sup> 李昊旻：《中拉“一带一路”民心相通领域的合作历程与前景》，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21 年第 6 期，第 20-21 页。

<sup>②</sup> 郭存海：《中国拉美研究 70 年：机构发展与转型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 年第 8 期，第 1-24 页。

国与拉美国家双边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推动了中拉整体合作层面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持。2018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发表《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认为“该倡议为中国同有关国家开展互利合作提供新的理念，注入新的活力，搭建新的平台”<sup>①</sup>。2021年《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和《中国—拉共同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均重申了2018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拉共同体成员国外长对中国外长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介绍表示欢迎和支持，认为该倡议可以成为深化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的重要途径。<sup>②</sup>中拉基于双边维度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实现并拓展了在区域层面合作机制的构建、合作共识的夯实、地区合作伙伴关系的加强的效果，进而又提升了彼此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强调，“中国和拉共同体成员国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促进和保护人权，支持多边主义，促进可持续、包容、韧性发展、消除贫困和缓解不平等的重要力量。我们愿在多边和国际场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沟通协调，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其二，在跨区域组织方面的合作层面。拉美国家积极加入中方主导成立的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新开发银行”，NDB）均是由中国主导成立的涉及“一带一路”建设融资的金融机构，成立以来吸引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加入。截至2022年11月，巴西、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尔和乌拉圭等国家相继加入亚投行。继巴西作为创始成员加入新开发银行后，2021年9月乌拉圭加入该行成为意向成员。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申请加入拉美相关国家主导成立的组织和协定。2021年9月和11月，中国分别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前者包括墨西哥、智利和秘鲁拉美三国，后者则是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三国共同发起成立的全球首份数字经济区域协定。

2. 观念型公共产品的作用。其一，实践“美好生活”理念。它联结了

<sup>①</sup> 中国拉共同体论坛网站：《中国—拉共同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2018年2月2日。[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zywj/201802/t20180203\\_6285012.htm](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zywj/201802/t20180203_6285012.htm)。[2023-05-03]

<sup>②</sup> 中国—拉共同体论坛网站：《中国—拉共同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2021年12月9日。[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zywj/202201/t20220112\\_10481445.htm](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zywj/202201/t20220112_10481445.htm)。[2023-04-12]

“中国梦”与“拉美梦”。反贫困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历史任务，中国和拉美国家均提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为达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摆脱贫困是首要前提。长久以来，对平衡与和谐的追求是拉美原住民宇宙观的哲学共识。在不损害他人和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共赢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关键。这与中国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中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追求的基本论述相辅相成。这样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中国梦”与“拉美梦”联结共融的基础。其二，共享绿色发展理念。当前，面对多重全球性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是中拉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目标。在后疫情时代，随着碳中和目标成为硬性环境约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不断涌现，基础性制度安排逐步完善，全球对绿色经济发展预期向好。在此背景下，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减少碳足迹，应对全球性、系统性风险，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拉双方的重要共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宣布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产业低碳转型与新能源发展持续发力，拉美国家也在积极寻求绿色复苏之路，加大力度推动能源领域治理。这一现实为发展理念高度契合的中拉双方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的合作思路与实现路径。

### （三）提升全球维度的合作伙伴关系

1. “一带一路”倡议密切了中拉全球合作伙伴关系。2016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在 2017 年 2 月的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自 2017 年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等相继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共识。<sup>①</sup>这其中，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包括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2. 拉美成为中国倡导的其他重要公共产品的全球合作伙伴。继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分别于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提出了三个重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了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其中，旨在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sup>①</sup> 中国政府网：《特稿：写入联合国文件的中国理念造福世界》，2020 年 9 月 17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17/content\\_5544298.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17/content_5544298.htm)。[2023-04-18]

展议程、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全球发展倡议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其一，中拉在区域维度的良好合作为双方在全球维度的合作打下基础，并从“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全球发展倡议”等国际公共产品。2021年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表示，“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信倡议将有助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不让任何人掉队”<sup>①</sup>。其二，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夯实的双边维度合作伙伴关系构成了双方在全球维度合作的重要支撑。2022年6月，阿根廷和巴西领导人出席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2022年9月，中国与秘鲁、古巴、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安提瓜和巴布达、萨尔瓦多等国的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抗疫和疫苗等项目入选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项目清单，占项目清单的14%。<sup>②</sup>2023年4月，中国和巴西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愿意探讨南美一体化等巴西发展政策和投资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发展政策和国际倡议进行对接。

3. 双边和区域维度合作成为中拉全球治理合作的根基。2022年6月，金砖国家发表《金砖国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和世贸组织改革声明》。2023年中国和巴西积极评价两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的对话和协调，并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及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基础四国”等多边机制下的交流合作。中方支持巴西在2025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双方将持续深化金砖框架下的各领域合作。<sup>③</sup>

### 三 实证分析

从双边、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到国际事务的协同，中拉共建“一带一路”

<sup>①</sup> 中国政府网：《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通过《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2021年12月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08/content\\_5659408.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08/content_5659408.htm)。[2023-04-18]

<sup>②</sup>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项目清单》，2022年9月29日。<http://www.cidca.gov.cn/download/qfzcyxmqd.pdf>。[2023-06-01]

<sup>③</sup> 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2023年4月14日。[https://www.mfa.gov.cn/wjb\\_673085/zjzg\\_673183/xws\\_674681](https://www.mfa.gov.cn/wjb_673085/zjzg_673183/xws_674681)。[2023-06-01]

的实践不断深化,并持续带动多边层面合作。在前文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本节从实证分析角度,选取可反映中国与拉美 33 个国家的双边合作“五通”的代理变量构建量化模型,并结合多边指标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试图为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作用和影响提供更多实证证据。

### (一) 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从现实数据上验证中拉互联互通对实现双边国际事务协同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实证模型,并将“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一系列可以反映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主要特征的代理变量分别纳入回归分析,同时,实证模型还加入了控制变量及工具变量以提升模型的识别度和稳健性。实证样本为拉美地区 33 个国家 2018—2020 年连续三年的面板数据。面板回归基准模型构建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F_{i,t} + \beta_i Z_{i,t} + \mu_{i,t} \quad (1)$$

其中, $Y_{i,t}$ 代表国际事务协同, $F_{i,t}$ 为中拉互联互通水平代理变量, $Z_{i,t}$ 为控制变量, $\alpha_0$ 为截距项, $\mu_{i,t}$ 为误差项; $\alpha_1$ 和 $\beta_i$ 分别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和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矩阵。

对于中拉互联互通,从“五通”角度分别选取五个代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构建面板回归方程组如下(变量名见表 1):

$$\begin{aligned} Treaty_{i,t} = & \alpha_1 + \alpha_1 Beltroad_{i,t} + \beta_{11} GDP_{i,t} + \beta_{12} Open_{i,t} + \beta_{13} Stability_{i,t} \\ & + \beta_{14} Effectiveness_{i,t} + \beta_{15} Rule_{i,t} + \mu_{i,t} \end{aligned} \quad (2)$$

$$\begin{aligned} Treaty_{i,t} = & \alpha_2 + \alpha_2 Route_{i,t} + \beta_{21} GDP_{i,t} + \beta_{22} Open_{i,t} + \beta_{23} Stability_{i,t} \\ & + \beta_{24} Effectiveness_{i,t} + \beta_{25} Rule_{i,t} + \mu_{i,t} \end{aligned} \quad (3)$$

$$\begin{aligned} Treaty_{i,t} = & \alpha_3 + \alpha_3 Goods_{i,t} + \beta_{31} GDP_{i,t} + \beta_{32} Open_{i,t} + \beta_{33} Stability_{i,t} \\ & + \beta_{34} Effectiveness_{i,t} + \beta_{35} Rule_{i,t} + \mu_{i,t} \end{aligned} \quad (4)$$

$$\begin{aligned} Treaty_{i,t} = & \alpha_4 + \alpha_4 Load_{i,t} + \beta_{41} GDP_{i,t} + \beta_{42} Open_{i,t} + \beta_{43} Stability_{i,t} \\ & + \beta_{44} Effectiveness_{i,t} + \beta_{45} Rule_{i,t} + \mu_{i,t} \end{aligned} \quad (5)$$

$$\begin{aligned} Treaty_{i,t} = & \alpha_5 + \alpha_5 Confucius_{i,t} + \beta_{51} GDP_{i,t} + \beta_{52} Open_{i,t} + \beta_{53} Stability_{i,t} \\ & + \beta_{54} Effectiveness_{i,t} + \beta_{55} Rule_{i,t} + \mu_{i,t} \end{aligned} \quad (6)$$

模型(2) — (6)的 VIF 数值分别为: 2.43、2.73、6.37、2.51、4.22。因而可以判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构建适当。随后我们采用 LM 研究和 Hausman 检验决定参数估计方法,并根据检验结果来确定适用的估



计方法，提升模型估计的有效性。<sup>①</sup>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包括遗漏变量偏误、双向因果等内生性潜在来源，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构建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代理变量对多边合作代理变量的回归模型，在数据层面验证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是否对中拉多边合作有促进作用。<sup>②</sup> 模型方程如下：

$$S1: Par1_{i,t} = \alpha_6 + \alpha_6 Route_{i,t} + \beta_{61} Stability_{i,t} + \beta_{62} Rule_{i,t} + \mu_{i,t} \quad (7)$$

$$S2: Par2_{i,t} = \alpha_7 + \alpha_7 Route_{i,t} + \beta_{71} Open_{i,t} + \beta_{72} Stability_{i,t} + \beta_{73} Effectiveness_{i,t} + \beta_{74} Rule_{i,t} + \mu_{i,t} \quad (8)$$

$$S3: Par2_{i,t} = \alpha_8 + \alpha_8 Goods_{i,t} + \beta_{81} Open_{i,t} + \beta_{82} Stability_{i,t} + \beta_{83} Effectiveness_{i,t} + \beta_{84} Rule_{i,t} + \mu_{i,t} \quad (9)$$

$$S4: Par2_{i,t} = \alpha_9 + \alpha_9 Confucius_{i,t} + \beta_{91} Open_{i,t} + \beta_{92} Stability_{i,t} + \beta_{93} Effectiveness_{i,t} + \beta_{94} Rule_{i,t} + \mu_{i,t} \quad (10)$$

## (二)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部分的面板模型共涉及如下四类变量。

1. 被解释变量。模型被解释变量主要用来反映中国同拉美国家之间在国际舞台上相向而行及协同程度，以国际事务协同度为变量名，以中国同拉美国家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数量为代理变量。

2. 解释变量。模型解释变量主要为能反映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重要属性的代理变量。其中，“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最重要的五个方面。通过对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成果的跟踪以及前期中拉互联互通指数的构建，经验选取是否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航线双边联通性指标、双边货物贸易规模、是否获得中国主权贷款、孔子学院数量为相应代理变量。

3.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和经典理论模型，纳入国内生产总值（GDP）、贸易开放度（*open*）、政治稳定性（*stability*）、政府有效性（*effectiveness*）、法律规则（*rule*）等主要变量。考虑到样本期较短，采取单控制国别固定效应。

4. 工具变量。选取中国民众对拉美国家检索关注度、拉美国家民众对中

<sup>①</sup> 以模型（2）为例，在以 *belroad* 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首先判断模型的估计方法适用混合回归（OLS）还是随机效应（RE），通过 LM 检验得到 P 值为 0.00，拒绝原假设，表明 RE 优于混合 OLS。之后判断模型适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FE），通过 Hausman 检验得到 P 值为 0.0002，拒绝原假设，模型使用 FE 优于 RE。模型（3）—（6）的处理方法同模型（2）。

<sup>②</sup> 具体模型略去，如需详细信息可与作者联系。

国检索关注度作为工具变量。一般而言，检索关注度认为同中拉双边合作有密切关联，尤其是在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层面，但检索关注度并不直接影响双边国际事务协同进展。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见表 2。

表 2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国际事务协同	数值变量。以中国同拉美国家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数量为代理变量，取条约生效时间划分节点，剔除“无 entry_year”的数据，剔除双边条约，数据截至 2020 年；以 <i>treaty</i> 表示	UN treaty collection、外交部条约数据库
政策沟通	虚拟变量。以是否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代理变量，已签订取 1，未签订取 0；以 <i>beltroad</i> 表示	中国“一带一路”网
设施联通	数值变量。以航线双边联通性指标为代理变量，原始数据已进行标准化处理；以 <i>route</i> 表示	UNCTAD, Liner shipping bilateral connectivity index, annual
贸易畅通	数值变量。以双边货物贸易规模为代理变量；单位为每 10 亿美元，以 <i>goods</i> 表示	中国国家统计局
资金融通	虚拟变量。以是否获得中国主权贷款为代理变量，已获取设为 1，未获取设为 0；以 <i>loan</i> 表示	Inter - America Dialogue, China - 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s
民心相通	数值变量。以孔子学院数量为代理变量；数字表示中国在该国建立孔子学院数量，0.5 表示孔子学院正在筹办中，0 表示尚未建立孔子学院；以 <i>confucius</i> 表示	中国汉办官网、中国与拉美国家合作对接高校网站，以及相关媒体报道
控制变量及工具变量 1，工具变量 2	根据模型需要选取包括 GDP/10 亿美元、贸易开放度 ( <i>open</i> )、政治稳定性 ( <i>stability</i> )、政府有效性 ( <i>effectiveness</i> )、法律规则 ( <i>rule</i> ) 等在内的控制变量，以及用于控制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 1 为中国民众对拉美国家检索关注度，工具变量 2 为拉美国家民众对中国检索关注度；分别表示为 <i>control variable</i> 、 <i>iv1</i> 、 <i>iv2</i>	世界银行数据库、Google 趋势检索格式为关键词 + 检索来源国 + 时间 (2018/1/1 - 2020/12/31) + 所有类别 + Google 网页搜索热度数值范围是 0 ~ 100、百度搜索指数
多边合作 1	以中拉部长级会议等活动参与情况为代理变量；以 <i>par1</i> 表示	中国—拉共体论坛官网、中国外交部、商务部、拉美各国外交部及主要媒体报道统计所得
多边合作 2	以中国参与拉美国家作为成员的区域组织活动为代理变量，以 <i>par2</i> 表示	中国外交部网站整理统计所得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如表 3 所示，中国和拉美国家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数量均值为 233 个，最大值 349 为中国和巴西 2020 年共同签署国际条约数量，最小值 127 为中国和圣基茨—尼维斯 2018 年共同签署国际条约数量，标准差为 63.48。解释变

量 *beltroad* 和 *load* 均为虚拟变量，“贸易畅通” *goods* 最大值 12047.1 亿美元为中国和巴西 2020 年的货物贸易额。

表 3 变量描述统计值

变量	最小值	均值	最大值	标准差
<i>treaty</i>	127.000	233.616	349.000	63.480
<i>beltroad</i>	0.000	0.535	1.000	0.501
<i>route</i>	0.000	0.211	0.412	0.115
<i>goods</i>	0.101	94.836	1204.710	228.323
<i>load</i>	0.000	0.424	1.000	0.497
<i>confucius</i>	0.000	1.313	11.000	1.980
<i>par1</i>	0.000	0.778	3.000	0.693
<i>par2</i>	1.000	1.727	4.000	0.901
<i>iv1</i>	187.000	1448.232	8767.000	1377.986
<i>iv2</i>	4.865	22.590	42.289	8.079
<i>gdp</i>	0.500	196.083	2100.000	434.732
<i>open</i>	9.655	46.915	127.382	20.733
<i>stability</i>	-1.540	0.106	1.350	0.691
<i>effectiveness</i>	-2.030	-0.187	1.080	0.612
<i>rule</i>	-2.350	-0.258	1.090	0.699

资料来源：详见表 2。

###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在表 4 中报告，第 1—5 列分别对应基准模型 (2) — (6) 方程组的估计系数。结果显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对国际事务协同具有正向影响，即中拉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双方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具体而言，以是否签署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代理变量的“政策沟通”对国际事务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1.932（标准差 0.46）且在 1% 显著水平上显著，即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签订对双方国际事务协同有正向促进作用；以航线双边联通性指标为代理变量的“设施联通”对国际事务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73.530（标准差 16.52）且在 1% 显著水平上显著，即航线双边联通水平对双方国际事务协同有正向促进作用；以双边货物贸易规模为代理变量的“贸易畅通”对国际事务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0.095（标准差 0.016）且在 1% 显著水平上显著，货物贸易额每

增加一个标准差（每百万美元）带来双边国际条约共同签订数量增加 15.200，即双边货物贸易规模对双方国际事务协同有正向促进作用；以孔子学院数量为代理变量的“民心相通”对国际事务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2.483（标准差 0.67）且在 1% 显著水平上显著，即在拉美国家孔子学院数量对双方国际事务协同有正向促进作用；以是否获得中国主权贷款为代理变量的“资金融通”对国际事务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3.201，但不显著。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belroad</i>	1.932 *** (4.17)				
<i>route</i>		73.527 *** (4.45)			
<i>goods</i>			0.095 *** (5.76)		
<i>load</i>				3.201 (0.14)	
<i>confucius</i>					2.483 *** (3.71)
常数项	238.150 *** (94.47)	223.495 *** (47.88)	227.859 *** (19.44)	237.799 *** (13.37)	234.377 *** (18.8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NO	NO	NO
样本数	96	96	96	96	96
R - squared	0.300	0.335	0.229	0.224	0.246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内为 z 值。因篇幅所限，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略去。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为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IV）做进一步回归（见表 5）。在模型（4）和（6）中，工具变量 *iv1* 和 *iv2* 均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且一阶段模型（2）—（4）和（6）工具变量 *iv1*、*iv2* 的回归系数显著，只有模型（5）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证明该工具变量的选取对于模型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有效，尤其对于“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从工具变量选取思路可认为具有较好的效果。从 IV 估计系数来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对国际事务协同具有正向影

响，且在 5% 水平上显著，同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并相互印证。系数相较基准模型变大表示部分方程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但拟合系数显著和一阶段工具变量系数显著仍可支持基准回归的结论。

表 5 工具变量法 (IV)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belroad</i>	22.893 ** (2.04)				
<i>route</i>		724.78 ** (1.99)			
<i>goods</i>			0.434 ** (2.45)		
<i>load</i>				379.50 (0.92)	
<i>confucius</i>					12.794 ** (2.5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O	YES
样本量	96	96	96	96	96
Wald 检验 p 值	0.000	0.000	0.000	0.314	0.000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 内为 z 值。因篇幅所限，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略去。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 (四) 进一步分析

在这一节中，我们尝试验证前文关于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有助于实现从双边互联互通带动多边组织合作的论述。我们重点关注中拉论坛部长会议等活动的参与度和中国参与拉美国家作为成员的区域组织活动二者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或可为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正外部属性和外溢影响作用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撑。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以中拉部长级会议等活动参与情况为代理变量的多边合作 1 (*par1*) 和以中国参与拉美国家作为成员的区域组织活动为代理变量的多边合作 2 (*par2*)，被解释变量分别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的代理变量 *route*、*goods* 和 *confucius* 替换，保留控制变量，并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 (7) — (10)]。模型 *s1* 和 *s2* 的回归

系数均显示,设施联通对多边合作 1 和多边合作 2 这两个因变量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说明中拉加快基础设施合作对促进中国与拉美区域组织的进一步合作具有积极影响。模型 s3 回归系数显示,“贸易畅通”和“民心相同”对多边合作 2 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26 ( $z$  值 5.45) 和 0.1697 ( $z$  值 3.62)。回归的结果支持前文关于“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存在正外部属性的论述,尤其是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深度发展与拉美区域、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关系具有促进作用。<sup>①</sup>

#### 四 启示与展望

过去十年是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创新、发展和壮大的十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在包括拉美地区在内的全球各地进行伟大实践的十年,更是创造了辉煌成就的十年。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公共产品视角对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作了初步分析,并得到以下一些思考和启示。

第一,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对中拉之间形成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远比本文设计的分析框架更为复杂和深刻。即便本文所指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也包含了三个层次。具体而言,是基于双边维度、拓展到区域维度、提升至全球维度后,在“三个维度”之上以及各个维度之间形成的纵横交错的“互联互通”。若将上述联通称之为“大互联互通”,其中还包含一个“中互联互通”,即在双边维度上以“五通”为核心内容形成的“互联互通”。同时,还存在一个“小互联互通”,即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内容的“互联互通”,也就是设施联通。因此,未来对于本文主题的研究还有诸多拓展和深入的空间。

第二,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合作基础。双边维度的合作是中拉构建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无论是在 2015 年中拉论坛正式开启后中拉进入“双边+整体”合作的“双轮驱动”时代,还是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构筑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双边维度合作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依然如故。特别是在拉美地区一些次区域组织以及其他跨区域组织呈现弱制度化的运行机制、缺乏与其开展实质性合作的抓手的情况下,从而在该维度上合作的推进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双边维度合作的重要性凸显。

<sup>①</sup> 因篇幅所限,回归系数图略去,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第三，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时代背景。在百年大变局下，新冠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历史和人类的高度指明了全球治理的人间正道，相继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主张，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重要公共产品。<sup>①</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我们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sup>②</sup>

第四，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重大使命。中拉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携手全球治理合作。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短板，支持汇聚南南合作的力量，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sup>③</sup>

第五，关于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光明前景。共建“一带一路”即将开启下一个十年，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也迎来诸多积极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拉双方共建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拉双方正在为2024年中拉论坛成立十周年时拟召开论坛峰会创造条件，共同推动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中拉关系深入发展，等等。由此，有理由相信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必将迎来又一个“黄金十年”。

(责任编辑 史沛然 黄念)

<sup>①</sup> 新华社：《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2023年4月3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142426079935258&wfr=spider&for=pc>。[2023-06-01]

<sup>②</sup>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zhuanti/zggcdescqgdbdh/sybgqw.htm>。[2023-02-20]

<sup>③</sup> 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2015年10月17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xgcdt/68687.htm>。[2023-05-08]